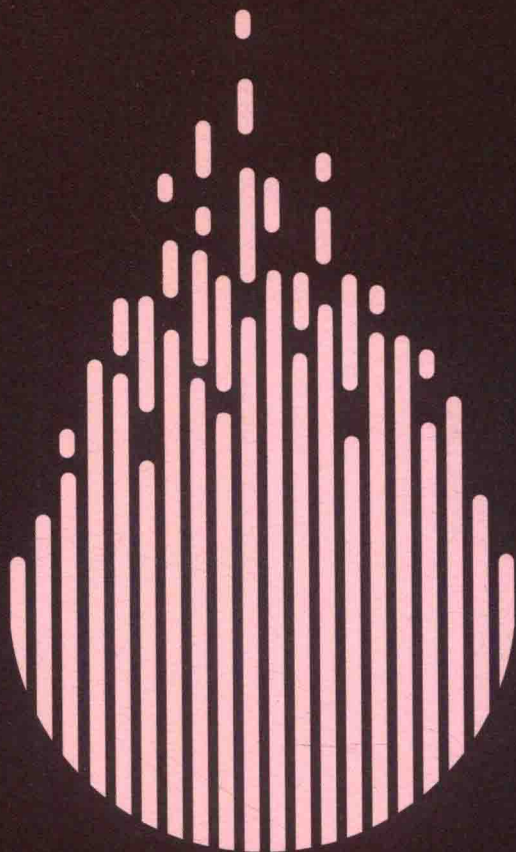


谭光辉

著



中国百年流行小说

1900 — ◆ — 2010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非外借

谭
光
辉

著

中国百年 流行小说

1900 — 2010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百年流行小说:1900—2010/谭光辉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8

ISBN 978-7-100-15668-4

I. ①中… II. ①谭… III. ①小说史—研究—中国—
1900—2010 IV. ①I207.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5293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中国百年流行小说:1900—2010

谭光辉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668-4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56

定价:258.00 元

第八章 民族仇恨与阶级仇恨高涨： 十七年流行小说

(1949—1965)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不仅在政治上以崭新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在文学方面亦与上一时期划出了明晰的界线。与此相应的是，流行小说风貌发生重大转折。由于十七年文学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过大，当代许多学者认为，十七年流行小说并不能真实反映大众文化心理。本书的观点恰恰与此相反。流行小说不仅是读者的自觉选择，亦会反过来影响读者的选择。另外，无论是因为选择面狭窄而导致某些小说流行还是因意识形态干预某些小说流行，流行小说也是一个既定事实，它不仅标示了大众文化特征，而且也改变了大众文化特征。所以，十七年流行小说仍然是研究十七年大众文化心理的重要依托。

第一节 十七年流行小说概览

十七年出版的小说不少，但真正流行的小说却不到 50 部。大多数小说很少有人知晓，新时期后亦无再版。以 1956 年由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陆柱国的小说《上甘岭》为例，虽有电影的推动，再版次数仍然有限，1956 年艺术出版社印 1 万册，195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 2000 册，1960 年第 2 次印刷 2000 册，一共只印了 1.4 万册。更多的小说是默默无闻的，包括许多名作家的小说，例如康濯的《正月新春》《黑石坡煤窑演义》《一个知识青年下乡的故事》《工人张飞虎》，袁静、孔厥的《中朝儿女》，周而复的《山谷里的春天》《燕宿崖》。十七年小说，印数在 10 万册以内都算不得畅销，因为大多由新华书店统一发行，经销渠道较为畅通，所以动辄印数上万。少年作家刘绍棠的小说《青枝绿叶》，1953 年 6 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初印 2 万册，1954 年 1 月第二版再印 8000 册。1984 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印数 4.7 万册。即使是这样的印数，在十七年小说排行榜上也难见踪影。另外，没有再版的小说也很难上榜，例如欧阳山的《英雄三生》，作家出版社 1955 年 4 月出版，初印 3.2 万册，之后再无重印，我们不能因此认为该小说就一定有 3.2 万册的发行量。十七年的流行小说的认定，一要看印数，二要看印次。只有不断翻印，才能证明确实有很大的需求量。

本书从众多的小说中寻找、比较、统计，把在十七年文学中掀起了接受热潮、印量多、翻印次数多的小说做成了一个排行榜，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十七年流行小说的概貌。

十七年小说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流行小说史。在当代文学史上书写篇幅最大的作品都是最流行的小说。流行小说与主流文学严重同一化，是十七年小说最鲜明的特色。

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史开始关注十七年文学中的非流行小说，将所谓的表现“人性”的作品加大力度书写，这种书写方式会给人留下一种很深的误解，模糊了历史的面目。可见学院式的经典化也是一种遮蔽历史的方式。例如，对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小说的重新发掘，加重论述，试图证明在50年代小说中，也有部分作家敢闯禁区，难能可贵。但是事实上，这些小说在当年并无太大影响。陆文夫的短篇小说集《小巷深处》，发表于1956年10月号《萌芽》上，不久即被批判。195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陆文夫短篇小说集《荣誉》，1964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二遇周泰》，均未收录此篇。1980年1月短篇小说集《小巷深处》才收录该小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印数5万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于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随后作者被打成右派，小说再无出版。1979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将这一系列小说汇编成册，收入《重放的鲜花》，初印10万册。在这个集子中，曾经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毒草的作品。包括上述三部作品在内的干预生活的作品，终于可以重见天日。

无疑，政治运动让许多作品失去了直面读者的机会，或由于政治运动使许多作品不能再版而与人民见面，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小说对50、60、70年代的读者影响极小，这也是事实。不能因为50、60年代读者有可能更倾向于接受某些作品而判断此期的大众文化心态，历史讨论必须基于事实。固然，一小部分敢闯禁区的作品昭示了大众文化的某种可能，但这种可能很快被压制，这种可能就只剩下一个指示性的箭头，锋芒已被削去，它没有射穿历史。

第二节 50 年代初期的革命历史主旋律

十七年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没有多大作为，多数小说没有强烈的轰动效应，作家们也处于摸索和试探阶段。一个全新的政权刚刚建立，意识形态尚不明朗，文化形态也正处于探索阶段。这就需要一系列的文件、政策、运动、批判来确立意识形态和文化规范。因为文化方向的不确定性，50 年代初期出版的作品只能延续解放区模式才不失为稳妥之策。除了解放区模式的小说之外，抗美援朝题材也在被允许之列。新中国成立初期几年，小说创作方面无大的作为，流行小说上榜图书除新中国成立前的《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外，仅有《铁道游击队》《保卫延安》《平原烈火》《三千里江山》《风云初记》《铜墙铁壁》等几部值得一提。无一例外，这些小说都与战争有关。这与《吕梁英雄传》和《新儿女英雄传》开辟的道路不无关系。政治允许，读者欢迎，便是这类文学存在的充足理由。

一 新中国抗日战争小说先驱：《平原烈火》《风云初记》

《平原烈火》1950 年 7 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可以看作新中国战争文学的先驱。《平原烈火》在 50—70 年代共印 40 余万册，至 2005 年印刷 57 万余册，已经可以当之无愧地步入畅销书行列。

《平原烈火》的作者徐光耀（1925—，河北雄县人），有着丰富的游击战争经



徐光耀



孙犁



验，非常善于把握这一题材。1946年，冀中发起一个“抗战八年写作运动”，这一运动号召每个识字的人都写一写抗战中最令人感动的事，徐光耀在这一运动中写过两篇类似报告的东西，但发出去之后都石沉大海，徐光耀总结道：“为什么在自己过去的作品中，从来没有解答过‘解放军为什么打胜仗？为什么能在残酷环境中由小到大并完全战胜了优势的敌人？’这一问题，并在最后批判了自己的工作情绪不够饱满愉快，摆老资格，对新鲜事物缺乏敏感的错误行为。”^①即是说，即使把最真实的战争情况记录下来，也不见得能得到认可。一部受欢迎的作品必须解释大众的疑问，还得符合党的政策。这一认识既是经验总结，又是对后来者的引导。在对《平原烈火》的多篇评论文章中，讨论得最多的是“应该”怎样安排刘一萍的结局问题，似乎一个文本中的人物，“应该”按照某种逻辑有一种必然的命运一样。

《平原烈火》讲述了一个游击队由挫败、隐蔽，逐渐发展成一支壮大的队伍，最终战胜敌人的故事。1942年，日本鬼子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中队长周铁汉、大队长钱万里、副政委薛强带领部队突围，百十人的队伍仅剩37人，不得已只好将队伍分散隐蔽，并坚持战斗。在一次战斗中，周铁汉身受重伤。养伤期间，被人告密被捕。周铁汉经历了毒刑拷打、威逼利诱，但他不但没有屈服，反而在狱中成立了党小组。后来他带领狱中同志成功越狱，壮大了队伍。与之对照，二中队队长刘一萍消极悲观，丧失

^① 徐光耀：《我怎样写〈平原烈火〉》，《徐光耀文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斗志，薛强多次教育无效。在一次战斗中被包围，他不积极突围，带领队伍钻入地洞，结果被敌人用瓦斯毒死。钱万里和薛强吸取教训，主动向敌人出击，周铁汉带着一条残废的胳膊参加战斗，取得了不少胜利，队伍也逐渐壮大起来。最后，钱万里带领全大队战士，英勇作战，拔下了一个驻有一小队鬼子和一百多“皇协军”的据点。

《平原烈火》至少开辟了如下几条创作路子：第一是开辟了战争文学的路子，革命历史将成为新中国最受关注的题材；第二是开创了路线斗争与思想斗争的创作套路，新中国成立后大部分小说都将涉及这一领域，对正确与错误的判断成为文学作品的常规思路；第三是英雄模式将成为解释历史的主要方式；第四是传奇的故事结构是使小说具有可读性的最重要原则。

孙犁的《风云初记》和柳青的《铜墙铁壁》都出版于1951年，可以看作是新中国初期的尝试性作品，也可看作是对《平原烈火》创作观念的一个呼应。《风云初记》1951年10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2年12月2版，首版印1万册，2版印至1.5万册。

《风云初记》在当代流行小说中只能算是一个热身和预演，到2005年才11万册的印数实在算不上多。作为孙犁（1913—2002，原名孙树勋，河北衡水人）的唯一长篇小说和50年代较早的长篇小说，其主题基本上只能在革命历史题材的领域之中展开。

《风云初记》以滹沱河两岸的子午镇和五龙堂为背景，以高、吴、田、蒋四姓五家为关系线索，讲述了抗日战争初期冀中平原上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抗日武装力量、组织抗日政权的故事。一共三集，前两集分别出版于1951年和1953年，三集合排本出版于1963年。小说规模宏大，人物较多，情节曲折。子午镇吴家有两个女儿，大的叫秋分，小的叫春儿。秋分嫁给了五龙堂的高庆山。10年前，高庆山领导农民暴动失败后离开，1937年回乡组织抗日武装和抗日政权，成立了人民自卫军并任支队长。春儿与地主、村长田大瞎子家的小长工芒种相爱，春儿不但积极支持芒种参加人民自卫军，而且领导子午镇的妇女自卫队打击日寇，组织民兵保卫村民麦收。春儿和芒种后来都积极进步，加入了共产党。二人深造学

习后，芒种回部队做了指导员，春儿留校做了下期学生小队长。武汉失守后，芒种上了前线，春儿回后方工作。地主田大瞎子不断破坏抗日工作，后来因赖租等罪行被区政府从严法办。田大瞎子的儿媳李佩钟是共产党员，积极投身革命，成为高庆山的得力助手，后做了县长，办事不徇私情，为了工作分别惩处了自己的公公和父亲。她的丈夫田耀武破坏抗日，她便离了婚，后来她被田耀武击伤并牺牲。子午镇还有个叫高疤的大贼，拉了些人自封为团长，娶了蒋家的俗儿为妻。高疤的队伍被高庆山改编成人民自卫军，但他不听指挥，受批评之后叛变，后来与田耀武联手破坏抗日。其妻俗儿为人放荡，也帮助他干了不少坏事，后被区政府处决。小说结尾时，人民与军队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长城，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对敌人的战斗。

《风云初记》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延续了孙犁 40 年代的“人民参战”的创作模式，农村中的农民夫妇，都有很高的政治觉悟，不但人性美好、勤劳勇敢，而且有坚定的革命斗志；二是为 50 年代的抗日战争题材小说探索了道路、建构了模式。

二 群众战争路线的深化：《铜墙铁壁》

柳青（1916—1978，原名刘蕴华，陕西吴堡人）的《铜墙铁壁》1951 年 9 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围绕沙家店粮站的工作展开叙述：沙家店区委委派



柳青

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分子、沙家店干部石得富主持沙家店粮站工作，沙家店粮站是在解放战争中为进攻榆林的部队提供粮食的主要据点。石得富带领群众与敌人展开了艰苦的斗争，保护了粮食，为解放军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小说的中心意思，表面上看是阐释毛主席的思想，这一思想印在小说的扉页上：“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但实际上，铜墙铁壁至少意指两个方面的内容，群众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战争全部按毛主席的预想进行和发展，正确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就是战争取得胜利的铜墙铁壁。

《铜墙铁壁》影响颇大，但在20世纪70年代再版时却颇费周折。50年代初期的战争小说，还处于探索期，只要基本面是好的，受到的限制相对较少，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它与其他作品的再版一样，面临许多的麻烦。1962年再版时，删去了彭德怀、刘景范的名字。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筹划再版工作，但修改再版工作一直进行到1976年。据责任编辑何启治回忆，各种政治要求都被加在书中，除柳青坚持的主要故事情节不改之外，细节的改动极多，包括让石得富形象更高大、把群众作用写得更大、要更好体现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作用、删去刘少奇的话等，后来又要查有没有谈孔孟、有没有为彭德怀“招魂”等内容。^①《铜墙铁壁》的修改过程很能说明50、60年代小说的生产过程，小说往往不是按作家的意见写，而是作家出底稿，由编辑部和其他主管部门共同完成。主题思想全都按意识形态的要求来设定，许多的意见被加在小说之上。

但不论《铜墙铁壁》的主题思想如何修改，读者喜欢的却并不是这一部分，他们真正喜欢的是战争本身。战争是人类最残酷的游戏，其本身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刚刚经历了战争的民族。任何爆发战争的时代，多数人不直接参与战争的，但他们却渴望了解战争，特别是渴望知道战争胜负的原因，这就需要当代文学作品给予刚刚取得胜利的战争一个合理的解释。《铜墙铁壁》给出了三个解释，一是符合造神运动的需要，二是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参与需要，三是满足了对英雄的期待需要。让人民群众相信自己是战



^① 参何启治：《世纪书话——我和当代优秀长篇小说的遇合机缘》，《美丽的选择》，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2页。

争胜利的首要因素，就满足了他们的被叙述渴望。在对英雄人物的塑造方面，《铜墙铁壁》尽最大可能保留了英雄人物作为普通人物的一面，但这一点却遭到了多方的批评。例如一位叫李枫的评论者认为小说在处理石得富被俘的表现时处理不当，“我们描写英雄应该描写他机智的战斗，越在紧急关头，意志越要坚定、沉着、果断，以智慧和勇敢战胜敌人这样才能给人以教育”。而“迷浑敌人，瞅机会向敌人索取死的代价”是“在‘迷浑敌人’的掩盖下向敌人投降”，“是一种带有原则性的错误”。^①当然，《铜墙铁壁》处理英雄人物的方法被批，给予之后的战争小说一些启示，这种人性化的模式在后来的战争小说中越来越少，英雄人物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坚强。塑造英雄的原则在此时已经被确立。

三 凸显领袖智慧的人民战争：《保卫延安》

战争本身的迷人和对战争胜利的解释成为此后战争小说创作关注的焦点，英雄分为两类，一类是处在幕后的指挥者，他们成为英雄是因为他们的智慧和正确的指导思想；二类是来自群众中的英雄，他们成为英雄主要是因为忠诚和坚强。



杜鹏程

战争小说的此种模式分化为两类，一类为塑造高级将领类英雄，一类为塑造平民英雄。前者的代表作品是《保卫延安》，后者的代表作品是《铁道游击队》。

《保卫延安》195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事实上，它是由报告文学改写成的小说。杜鹏程（1921—1991，陕西韩城人）于1947年3月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保卫延安的战争，1949年开始撰写，历时九个多月写完报告文学文本，然后花了四

^① 李枫：《评柳青的〈铜墙铁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编辑委员会：《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1页。该文原载《文艺报》1951年第5卷第3期。

年多时间将其改成小说文体。《保卫延安》出版后引起很大的反响，1954年6月出第1版，到1955年4月就重印7次，印数达到70万册。后来它一共印了多少次已经很难考证，我们只能根据杜鹏程的《重印后记》知道1956年和1958年作者曾作过较大的修改，粉碎“四人帮”后出版了第4个版本，此版本以1958年版本为基础。杜鹏程说此书在1959年被停印之前已经印到近100万册。^①1963年开始该小说被禁毁，1956年之后的版本已经难以找到。1979年人



民文学出版社根据1956年版重印20万册。从读者反响方面看，“1954年到1961年间关于《保卫延安》的评论文章共计54篇”，而这些文章都是“从解放军战士、以彭德怀为主的高级将领等人物形象塑造和战争场面描写三个方面肯定了《保卫延安》的史诗价值”。^②从这方面来看，《保卫延安》被读者看重的原因也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高级将领英雄人物的塑造，二是普通英雄人物的塑造，三是战争场面的展现。“《保卫延安》是最先尝试着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的小说之一”^③，这可能是它大受欢迎的第一个原因。彭德怀形象塑造得非常生动，33万字的篇幅有1万多字属于他，这就为读者了解共产党的高级将领打开了一扇窗户。《保卫延安》的厄运也因此而生，一旦小说涉及具体人物，便要承担相应的政治风险。1959年被停印，1964年被销毁，“文化大革命”期间凡是赞美过该小说的人都被批斗，制造了无数冤狱。小说的第二个亮点是塑造了一大批人民英雄形象。杜鹏程亲自参加过此次战斗，目睹了战士们的战斗与生活，因而倾注了极强的感情，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小说的第三个特点是小说描绘了具有真

① 杜鹏程：《〈保卫延安〉重印后记》，《杜鹏程文集》（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7页。

② 吴秀明：《当代历史文学生产机制和历史观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

③ 杜鹏程：《〈保卫延安〉重印后记》，《杜鹏程文集》（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6页。

实感的战争场面，既细致入微又大气磅礴。《保卫延安》以小说的方式写真实的战争，以虚构的场面写历史，亦真实亦虚构，既能满足读者对再现战争场面的历史期待，又能满足对战争胜利原因的解釋期待，同时还能满足对传奇故事的猎奇期待。

《保卫延安》以其故事内容命名，讲述了延安保卫战的故事。1947年3月，蒋介石命胡宗南以数十万兵力进犯我党所在地延安。我军在山西的一个纵队，奉命参加延安保卫战。当他们来到距延安不远的地方时，连长周大勇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撤出延安的决策，全场恸哭。随即战士们理解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群情激昂。我军在青化砭设下埋伏，全歼敌人一个旅四千人。随后，彭德怀司令员亲自指挥蟠龙镇攻坚战。周大勇奉命诱敌北上，牵引敌人十万多人在山头打转，我军顺利攻下蟠龙镇。当敌人回到蟠龙镇时，我军已转移到真武洞地区休整。胡宗南为扭转败局，继续疯狂进攻，周大勇率领连队战士，出其不意地与敌人巧妙周旋，英勇作战，攻克三岔湾，攻打榆林，突出重围。彭德怀按照党中央指示，决定在沙家店地区歼灭敌人主力。战斗异常激烈，周大勇连队攻下最后一个阵地，与大部队一起继续追击敌人，开始了大反攻，期间周大勇升任了营长。敌人丢盔弃甲，风声鹤唳。周大勇所在纵队奉命再向敌人前面插，让侥幸逃出的敌人又跌入天罗地网之中。我军遵照彭德怀司令的命令，穷追溃散之敌。营长周大勇又奉命率领队伍主攻延安的大门——崂山。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日子来到了。

不可否认的是，《保卫延安》出版之初，既符合意识形态需要，又符合大众审美需求，意识形态需要与大众审美需要达到了统一。将《保卫延安》写成小说，是解放军总政文化部的一项重要工作。总政文化部专门把杜鹏程从新疆调入北京，并把《保卫延安》列为“解放军文艺丛书”之一，可见《保卫延安》事实上是一个政治指导下的产物，冯雪峰看稿后，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对该小说大为赞

赏,^①亦可见其思想的正确性。出版之后好评如潮,读者欢迎,说明它在艺术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抛开众所周知被批判的原因,它在当代文学史上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冯雪峰为《保卫延安》写了2万字的长文《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后被收入《雪峰文集》时改名为《论〈保卫延安〉》,被认为是50—60年代对它分析最为深刻的文章,无人能出其右。冯雪峰认为,只要打开书读下去,就会感觉到一种迫人的鼓舞力量,“会很自然地振奋和紧张起来”,这部作品“是够得上称为它所描写的这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的”,因为最要紧的是“他掌握了这次战争所以胜利的关键和依靠来达到胜利的全部力量,掌握了这次战争的根本的和主要的精神”,这种主要精神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指挥以及人民解放军和革命人民群众的艰苦卓绝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是这部作品成功的关键”。冯雪峰认为,这种革命战争的精神“永远都有提高人们的英雄气概,鼓舞人们自我牺牲地、庄严伟大地奋勇前进的力量”^②。这种精神就是英雄史诗所应具有的精神。《保卫延安》的英雄史诗性质确实是它成功的关键,从这也可透视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众的文化心态的几个重要侧面: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参与热情以及救世主神话。

一个新的国家刚刚诞生之时,这几种心理是很容易滋生的,英雄主义可以解释新生国家诞生的理由,乐观主义可以给未来提供信心,参与热情可以克服国家建立之后的公民自卑感,救世主神话可以为初期的混乱价值观念提供基本正确的方向。

四 有趣的游击战争:《铁道游击队》

刘知侠(1918—1991,原名刘兆麟,笔名知侠,河南卫辉人)的《铁道游击队》1954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954年1月新文艺出版社第1版第1次印刷,

^① 杜鹏程:《雪峰同志和〈保卫延安〉》,韦君宜等:《怀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② 冯雪峰:《论〈保卫延安〉》,《雪峰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7—259页。